



课堂上的照片。
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

那年,我在仙庾当老师

黄明

我当老师的第一站是仙庾中心学校。那会有个六年级语文老师要休产假,我被找来补位。彼时我还没考编,是俗称的“代课老师”。

1

我个子小,大多学生都比我高。上课时还好,他们坐着,看不出别扭。但只要一到操场排队或是跑操,对比就出来了。可能身高拉近了我和学生的距离,很多时候,我们更像朋友。

我的办公室在教室隔壁,因而学生找我特别频繁。他们有时想听某首歌,想要我电脑找来播放一下。有时有问题也找我一起探讨,什么事都没有,就站到我旁边看一看,闲聊几句。那时班上兴起折纸热潮,我常收到他们送的各式写着祝福的折纸礼物。

女孩们会围在我身边,我的衣领乱了,她们像大人一样帮我整理,塞给我吃的,拉着我跳绳,有时高我一截的女生甚至会很自然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,叫我“小明明”。

虽是初生牛犊,但我不反感上公开课,学生们在课上也很给力。我在仙庾执教的一个学期,上过不止一次公开课,且代表学校去参加了区级的教学比赛和趣味运动会,写了两篇获奖师德征文。

2

因为通勤不便,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。里面有一张单人床,一张旧课桌和一把上了年纪的椅子。姐姐送我过去的,帮我把房间的一扇小窗子贴上家里带来的花色窗纸。

学校不提供早餐,而校外的粉面馆远而拥挤,我毫无外出觅食的兴致。于是想到了一个极为偷懒的办法来解决早餐——煮面条。我带了一副碗筷,一罐盐和一瓶老干妈,买了一个插电煮面杯,我早餐的所有物品就齐全了。我在煮面杯里烧开水,放进面条,煮熟捞出来。挑点盐,倒点老干妈,搅拌均匀,用这个方式对付一个又一个被鸟唤醒的早晨。

3

学校要举办“庆五四·迎六一”活动,班主任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。跟大家讨论了一番,最终决定跳舞。我挑选了乌兹别克斯坦经典舞曲《欢乐的跳吧》,召集了十几个女孩子,就着学生时代在学校跳过几支舞的薄弱底子,当起了她们的舞蹈老师,我们利用中午和放学的各个空档加紧练习。

然而女孩们聚在一起,各种小情绪层出不穷。我一会儿要哄这个,一会儿又要给那一对做调解,几次以为这个节目会中途放弃,好在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。

五月底,杜老师当向导,带我到市区一家服装租赁店挑选演出服。我帮学生们试穿了三套衣服,最终选定了一套橘红色服装,因为它热烈、闪亮又充满异域风情。我们扛着十几套衣服回来,带给学生们试穿,那一刻,她们欢乐、娇羞、满足,练习中的不愉快在叽叽喳喳中烟消云散。

演出那天,当鲜亮的橘红色在台上舞动起来时,收获了师生们的诸多目光。最终我们的节目获得了一等奖,我也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。

在我给学生们总复习和排节目双线行进之时,各地的教师招聘信息也陆续发布,我戴着电子手表穿梭于各个考场。

4

往夏天走,日子被越拉越长。吃完晚饭,太阳还明晃晃刺眼。我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走,把艳丽的天空走到褪色,直到暮色忽地倾覆下来,我就回办公室备课或复习。

学校里也有其他住校的年轻老师,但一到放学,见到他们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帅老师也住校,带着她二年级的儿子。杜老师家离学校不远,有时会在饭后回到学校来。有次我出去吃饭把钥匙锁在了办公室,就是他搬梯子爬窗户进入办公室帮我开的门。有回他加入我和帅老师母子的散步行列,走着聊着大家就有了翻墙出去的想法。平时我们明令禁止学生这样做,但现在却因这个计划极度兴奋。

杜老师是体育老师,身姿矫健。他先把我们三个挨个托上围墙,待我们坐定后,迅速翻越过去,跳到围墙外,又挨个把我们接下来。

翻过去后是另一处教师生活区,我们串一会儿门,就往荷塘走去。仙庾岭有数百亩荷塘,这是我第一次晚上来。星月的银光笼罩在荷塘之上,清透而纯净。十几年过去,那份清冽的香气还在我记忆里。

5

期末考试那天,学生们来得特别早。我还睡着没起来,他们的电话就催来了,说我懒得跟大熊猫似的,要我赶紧起来,早饭都给我准备好了。我匆忙洗漱完赶去教室,学生把一碗打包的炒粉递给我:“我没忍住吃了一口,不介意吧?”

然后毕业说来就来了。喜悦、不舍甚至有些许遗憾剧烈地缠绕。我的教师生涯的开篇,在五十来个学生的陪伴下,有了颜色,精彩纷呈。

我也考了编,上了岸。

去年,有学生联系我,聊天中得知她的孩子已经几个月大。今年,又忽闻帅老师病故的消息,感慨万千。

怀念曾经那些美好的人,人生仍要继续前行。

师者如光,微以致远

编者按

九月十日,教师节。这一天,让我们赞美每一位站在讲台上的人。

春华秋实,岁物丰成,对孩子的教育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,而教师,是履行这项伟大事业的人。这一期专版,专门献给这群可敬的人。版面里的几篇文章来自株洲不同年龄的教育从业者,语言风格不同,经历不同,但都指向同一个内核:站在讲台上的人,是如何影响一个孩子的。我们不做宏大叙事,不做煽情表达,只呈现一个老师的赤诚之心。愿读到的你,能从这些文字里感受到爱与智慧。

致敬所有以教书为业、以育人为志的人。

我的启蒙老师盛恒希

尹运中

时过几十年,我仍不时忆起启蒙老师盛恒希先生。

盛老师当时年约五十,但头发却已斑白。她总是容光焕发,平日将一头银丝梳得一丝不苟,显出一种知识女性的气度。

夏天她上身常穿一件质地柔和的白色短袖衬衫,冬春季她的着装则十分挺括,一件灰白色呢类衣服做成男人款式,齐领,颈下的风纪扣总是严实地扣着,透出几分威严。她总穿着一双被擦得锃亮的黑皮鞋。如此注重仪容,在当年的普通农村小学,确实显得另类。

小时候隐约听人说过,她是外省人,名牌大学毕业,抗战时期从北方流落到长沙。她的丈夫是攸县人,解放后她随丈夫回到攸县生活,并成为一名乡村教师。

盛老师十分散业,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。她不苟言笑,脸上总有一种凛然,上她的课,那些个性野的学生也如老鼠见了猫一般,特别规矩。

她教启蒙学生,就像教大学生一样,爱引经据典。课堂上她与学生没有什么互动,课外也少有接触,但学生就是爱听

命于她,顽童总被她收拾得服服帖帖,从没人敢在课堂上搞她的乱。

那时,每当上课铃声响起之后,便见她腋下夹着副蓝色封面的教案夹,手上拿着一根用竹片做的教鞭,从办公室威严地踱出来。进了教室后,将教案夹往讲台上一扔,接着用凌厉的目光扫视整个教室。干咳一声后,她便按花名册上的顺序逐个点名。被叫到名字的学生必须挺着胸脯响亮地回一声“到”,她才会点下头,示意你坐下。否则,她会加重语气将你的名字重新念一遍,还会将目光威严地盯着你,直至你发怵。

点名是她每堂课开始时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,因而,她的课从没有一个逃课的学生,这在当年的农村学校来说十分罕见。她前后教过我们四年,印象中,她除了常有圆睁怒瞪人的习惯外,似乎从没有对学生施行过体罚,甚至呵斥的现象也没有。

她对学生异乎寻常的严苛在我们班只出现过一次,被严苛对待的是一个老不按时上课的男生。那时,他家别出心裁地用几块白木板钉了一个小木箱给他当书包用。但无论上课还是下课,他总爱将它背在身上,样子显得十分滑稽。再加上他性子慢,每当老师上课正讲在兴头上,他突然来到教室门口喊“报告”,弄得所有学生将目光喇地投向了,十分夸张的小木箱变得格外醒目,惹得教室一阵哄堂大笑。

盛老师对工作尽职尽责。她当时

是学校校长,每天除了上课,其余时间总围着学校内外巡视。学校有个铜制铃铛,她不管走到哪,总将小铃铛随手捏着。一到上课的时间,她便摇动小铃铛。同学们听到响声马上停止撒野,朝教室里汹涌跑去。

她以校为家。几位老师中,似乎只有她一人天天住在学校。每天早晨她都早早起床,一声不响地来到路口,看着同学们一个个挎着书包走进学校。每天下午放学后,她又默默站在夕阳下,目送着同学们背着书包一个个离开校园。冬去春来,日日如此,令人肃然起敬。

盛老师很有学问,极善于讲故事。很简单的一堂识字课,被她教得有声有色,令学生们十分痴迷。比方说什么铁棒磨成针啦、神笔马良啦、白头翁啦、小猫钓鱼啦等等,她总是信手拈来。尤其是白头翁这个故事,很有教育意义,在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每次她在课堂上讲完这个故事后,总爱学着白头翁说话的口气哀嚎说:“哆哆哆,哆哆哆,寒风冻死我,明天就垒窝。”那凄切的语调,给了我们警醒;塞给我们学会了珍惜时光。

学校的四周是一片平阔的田地。一到春日,田地里一片蓬勃的绿,充满了生机。田野里四处回荡着盛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课声,她的声音悦耳动听,如一支美妙的音乐,飘在春日甜润的阳光里,飘过时光的河流,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心中……

三尺讲台,一辈子的良心账

朱智珍

前阵子参加完学校组织的教师读书分享会活动往回走,刷到一位教育同行引用老局长的话:“做有良心的教育。”我盯着屏幕看了许久。这话我自己念叨了几十年,也照着做了几十年。

常有年轻老师问,教书究竟图什么?既不是应付检查打分,也不是为了评职称涨工资。我想,无非是凭着心底那杆秤,做该做的事,尽力把它做好罢了。

教育是个良心事业

教了这么多年,我最认一个理:教书这事,少一点匠心,就缺一点境界。你敷衍半节课,或许某个孩子就落下一个知识点;你潦草断一次纠纷,或许某个孩子就憋下一份委屈。这些事不会立刻显山露水,可当老师的,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

前几天班上就出了件小事,到现在想起来,心口还热着。

体育课散了队,小雅红着眼睛来找我,胳膊上一道红印子,说是小菱拿跳绳甩的。我把小菱叫到办公室,这丫头梗着脖子不认错,末了还摆出一句网上学来的“受着”,模样拽得很。我一听火气就上来了——头一天她上课扰乱邻座,说的也是这句话。

那一刻我真想狠狠训她一顿,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教了一辈子我明白,发火是最省事的法子,却也是最没用的法子。教育靠的不是火气,是耐心。我压了压火气,盯着她的眼睛说:“班里个都是我手心的宝,我再生气都舍不得碰你们一下,你凭什么无缘无故欺负人?”让她拿出田字格本,工工整整抄二十遍“受着”,抄的时候好好琢磨琢磨,这话甩到别人心上,得有多沉。

本以为这事就了了,没想到俩孩子刚撤门帘出去,小雅又踮着脚蹭进来,小手揪着校服衣角,细声细气地说:“老师,我胳膊现在不怎么疼了,您别罚小菱了行不行?”那一瞬,我握着红笔的手顿住了。平时总在班会课上讲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,讲“海纳百川”,自己都怕说多了孩子嫌烦,原来早已悄悄落在了他们心里。

后来的语文课上,我当着全班的面,认认真真表扬了小雅的大度。话音刚落,小菱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,跑到小雅跟前,认真真道了歉,还小声补了句“谢谢你”。我知道,他们真真切切懂了那份善意。

你看,教育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你捧着

真心待孩子,孩子心里都有数。人心都是肉长的,种下善意的因,总能结出温暖的果。

教是为了不教

叶圣陶先生那句“教是为了不教”,我刚教书时就抄在备课本扉页上。教龄越长,越嚼出味道。跟老话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”是一个理;塞给孩子现成的答案,不如教会他们解决问题的法子。

拿修改病句来说,这是小学语文的老大难,死记硬背,孩子越记越乱。后来我就跟他们玩“句子医院”的游戏,孩子们轮流当“小医生”,给句子把脉、开方、治病。有个男生还自己画了枚“医生胸牌”,上课端端正正摆在桌前。每到这个环节,班里小手举得像小树林,玩着玩着,还真摸透了规律。

后来我不讲大道理了,只教他们两样本事:好好说话,换位思考。遇事我不先判对错,只问一句:“要是换作你是他,心里好受吗?”问得多了,便冷静下来,知道错在哪儿了。

我总跟孩子们说,老师不可能跟你们一辈子,替你们解决所有麻烦。教会你们自己拿主意、自己处理问题,以后走出校门、离开老师,也能走得稳、站得直,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。

除了讲台,我还能站哪儿?

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。身边老同事都在盘算往后养花、带孙、旅游的日子。我有时改作业改到深夜,望着窗外的桂花树出神:真走下这三尺讲台,我还能站在哪儿?

大半辈子都耗在教室里了,看着调皮的小不点慢慢长成懂事的少年,看着淘气鬼学会了体谅人,看着反应慢的孩子摸透了学习的门道——这种踏实的成就感,别的什么都比不了。

越临近退休,反倒越珍惜这讲台。以前偶尔抱怨琐事多、孩子吵,现在总觉得每一堂课、每一次和孩子聊天的机会,都金贵得很。有时候也自嘲,教了一辈子书,除了教书好像啥也不擅长。真离开这讲台,怕是连个用武之地都找不到。

真正的教育,从不局限在三尺讲台上。只要心里还装着孩子、守着这份良心,走到哪儿,哪儿就是我的讲台。

从教几十年,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,全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凭着良心教书,想着法子育人,守着讲台过日子。往后的日子,珍惜剩下的每一堂课,站好每一班岗。

摸着手里磨掉漆的红笔,想想这几十年的日子,忽然觉得——这一辈子,值了。这便是一个老教师最朴素的心愿。